

社會的眼睛 時代的良心

有關「知識份子」的界說很多，最普遍被人認定的一種即：知識份子是一個「關心他個人身處的社會及時代的批判者與代言人」。這應該是古今中外最典型的知識份子的形象，由於這個形象，知識份子被浪漫地認同為社會時代的眼睛與良心。任何人，他除了生物性的追求之外，還更有心理上的需求，人不止是一生物性的存在，他還有一種生命意義的追求，一種最終價值的追求。一言之，他有一種了解「為什麼」的需求。知識份子的最主要功能便是解答思索這個問題。

知識份子所以能夠解答思索問題，是因為與大眾相比較，讀書人較懂得使用文字表達情感和思想，而且也比較具有飾化世界和創造象徵意義的能力，由於他們能夠解釋行為和社會現象的意義（更重要地，由於他們創造了意義和價值），使他們在社會中具有懾服大眾的才氣與魅力。因此，往往無形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成為社會的中心。

一個理想的知識份子必須要有洞察事物的智慧，和一副關心天下社會的軟心腸。在一個面臨危機、轉變的社會和時代中，眾人不安、焦慮，對生命的意義與秩序發生懷疑與混亂的時候，知識份子責無旁貸，必須適時提供他們的見解，這些見解必須要能夠撥雲見日，足以安定人心，使眾人產生新的生命的意義，有效地領導社會進入新的精神秩序。在和平安定的社會時代中，知識份子卻不能一如旁人般地高枕無憂，很自然地，他總是傾向帶着懷疑與批判的眼光，他的想法與看法與社會現狀總是有距離的，如是他們才有敏銳的觸鬚，意識到潛伏於平安表面底下的危機；有客觀的距離，觀察出隱藏在光芒中間的黑暗死角。沒有一個現實社會是圓滿的，也因此知識份子總是無法對現實社會不保留的加以擁抱。不論如何，知識份子總多少帶着批判或反社會的性格。

所以像語言學者 N. Chomsky 所說「知識份子的責任是說出真理，暴露謊言」；詩人 L. Terlingetti 所說：「知識份子最大的貢獻是保持異議」。

中國的傳統社會是知識份子的天下，中國知識份子有其優美一面，也有醜陋一面，但是，一種關心社會天下的軟心腸是中國了不得的傳統；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十足表示中國文化為成就道德的性格，文天祥「讀聖賢書，所為何事？」正是一種使命感、責任感，所以中國知識份子的理想個性一向是悲天憫人，一向同情弱者，一向關照整個社會。在過去二千多年的專制局面，幸賴少數「先憂後樂」的偉大知識份子，才使得互互長夜，仍有一線光明。

經過了工業革命，中國舊有知識份子的社會結構隨著瓦解，但是一個新的培養現代知識份子的結構跟著出現，便是今日的大學。大學的出現，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因為知識份子對於政治權威的態度，常取決於社會與政治體之結構關係，如果知識份子在社會有立足之資，他就有較大之批判自由；如果在政治之外，尚有抗衡政治之憑藉，則他的批判自由將更大。在皇權社會，知識份子幾乎全為官吏，所謂「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既然知識份子都「受祿於吾君」，在情勢上，人情上皆難獨立站起來為道統講話。今日大學的出現，發展成為承載文化的自主性的結

構，獨立於政治之外，改變了知識份子的命運與性格。但在另一方面，却因大學的專業化、科技化，使得知識份子轉行為專家、學者，可是在一個動盪的社會中，知識結構中的人似乎不應該對大問題默無一語。事實上，分化的「科學的知識份子」也不乏跳出「科學家」的角色而扮演關心世事的「知識份子」的角色。愛因斯坦之論政治是最佳之例，中國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後崎嶇的現代化過程中，新型的知識份子，曾扮演了極具決定性的角色；但是其對社會的影響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負面的由來主要是認知能力的不足，他們走出象牙塔，奔向社會的十字街頭，雖然有關心世事的狂熱，却缺少反省世事的理智，有非常軟的心腸，卻沒有經過嚴格訓練的縝密的頭腦。終於各自抱著一套西方的意理，或者死守著舊社會的道統，造成知識份子的大分裂。而始終不能夠出現一套根植在中國人的特殊性格，卻可以實行於未來的學問。如果知識份子必須是社會時代的眼睛與良心，他不只應該有熱烘烘的心，也應該有冷靜的頭腦。對社會的關心與熱誠的同時，不應該免去衡量事實的義務。如果只用心，不用頭腦，恐怕免不了閉著眼睛說瞎話；反之，只用腦，不用心，免不了昧了良心說假話。而這兩者都是時下知識份子最容易犯的毛病。

洞察事物的能力，存在於絕對的理性當中，平常人在事情不關係自己的時候，往往能夠運用理智，認清真假對錯，秋毫細微的變化都立刻看得出來，但是如果事情牽動自己的情感或者利害攸關的時候，就不再能清晰地分辨真假與對錯。加上文化、傳統和政治理念也常常被有意地灌輸進入我們的腦子裡，姑且不論它們有好有壞，是對是錯，這些觀念很容易在我們的腦海裡佔據一方變為成見，而拒絕接受事實的核驗，影響了我們的判斷力。這些先天或後天的限制，是可以經由學習改善的，一個受過嚴格的科學方法訓練的知識份子，必然會知道，唯有以事實和經驗做根據，經過邏輯推理所得到的結論才是可信的。於是當眾人皆私慾薰心，倉皇迷惘時，獨有知識份子能夠撇開障礙，用冷靜得出奇的頭腦觀察事實，所以能夠見人所不能見，成為先知先覺。

思欲培養知識份子的關心社會同情大眾的情操，首先應該在大學校園提倡自由討論和批判的風氣，唯有在容許批評的環境下，才能喚起人們對世務的關心，所以前芝加哥大學校長 R. Hutchins 為大學所下的界說是：「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只有一個理由，即他必須是批判的中心。做為一個知識份子，最重大的責任是有什麼說什麼，是什麼說什麼；雖然他必然地為一個社會的批判者，但不一定要表現在反對現有的「體制」上，在經過良心反省之後，他們可以表現在對現有體制的維護上，有時對一個現有體制的維護也許需要比批判一個制度更多的良心和智慧。我們大學的教育似乎太偏重書本上的知識，使知識份子的知識和行為分離了；更由於那些監督愛護我們並親切承擔責任的長輩過度的用心，深怕我們跌跤，反而使我們喪失使用智慧的決心和勇氣。一旦離開學校，難保不會立即被同化污染，遑論擔任批評領導社會的角色！」

十九世紀初，德國亡於拿破崙，菲希特創辦柏林大學，發表告德人書謂：「德國的滅亡是由於知識份子自私自利的必然結果，德國已經在實力上失敗，唯有在教育上改革，求精神的自立，提倡自由討論，用道德與學問的進步來復興國家。」終於這所大學成為德國人才的淵藪，未幾德國遂成為西方哲學科學之領袖。廿世紀量子論、相對論與人造衛星都起源於德國。殷鑒不遠，值得我們再三深思！